



中国管理思想史系列丛书

中国 近古

——
宋元明清

管
理

Zhonggu

思想史

Juanli Sixiangshi

——
理思想的承接

主 编 王忠伟 王书汉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管理思想史系列丛书

中国近古管理思想史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承接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古管理思想史.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承接 / 王忠伟, 王书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3

(中国管理思想史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58 - 8656 - 8

I. ①中… II. ①王…②王… III. ①管理学 - 思想史 - 中国 - 宋代 ~ 清代 IV. ①C9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2673 号

责任编辑: 吕 萍 王 娟

责任校对: 王凡娥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邱 天

中国近古管理思想史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承接

主 编 王忠伟 王书汉

副主编 蒲岸华 秦铁山 王开璟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9 印张 300000 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8656 - 8 定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管理思想史系列丛书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王忠伟

副主任委员：唐志丹 卢晓君 初宇平

委 员：

费素斌	王亚东	黎洪昌	付宝新	李奇志
张德超	张琦	任成好	刘丽	高峰
赵亮	王亚芝	王德林	刘红	蒲岸华
李燚	于海勇	胡迎春	王书汉	王开璟
秦铁山	马晓琳	柳光露	徐大勇	张一志
姜鹤	刘洪玉	沈烈志	韩燕妮	王娜
王冰	李琦琪	朱晓林	王忠奇	董国娟
郭彬	安锋	董晓东	金玉然	王艳芳
贺伟	李艳文	李宁	禹哲	李学东
陈尔东	梁丹	罗葳	赵坚坚	沈鹤
赵博	李洪娜			

总 序

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学术团队，自2000年开始致力于此项研究，十年来，笔耕不辍，收获不小。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考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翻阅大量文献，越发感到祖国的伟大。翻开讲述西方管理思想史的书籍，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部鸿篇巨著，而在我们的管理学教科书中，中国管理思想的总结用不到一页的篇幅，提到《孙子兵法》、《周礼》，讲到齐田赛马，然后是“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其管理思想的沿革源远流长。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不可胜数，阐述管理思想的著作多如繁星。同国家的振兴一样，中国管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也到时日了。

对中国管理实践和思想的总结，应该有以下几个部分：(1) 传说时期管理思想的萌芽；(2) 夏商周时期管理思想的产生；(3) 秦汉至隋唐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4)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承接；(5) 近代管理思想的融合；(6) 现代管理思想的提炼；(7) 当代管理思想的升华。本丛书就这七个部分，分别为：《中国远古管理思想史》、《中国上古管理思想史》、《中国中古管理思想史》、《中国近古管理思想史》、《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史》和《中国当代管理思想史》。

可以坚信,通过整理和挖掘中国历代的管理思想及代表人物的实践和理论,从治世、经营、组织、驭人、教化和军争等方面归纳中国先人的光辉管理思想,人们会看到,西方的管理学大师也会相形见绌。这对弘扬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古为今用,融合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洋为中用,意义极大。

以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王忠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学术梯队,多年来在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研究方向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论及技巧体系,特色鲜明、研究思路清晰,并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成果,2005年被学校列为重点扶植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立意高远,旨在总结中国的管理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原理,形成《中国管理学》,功在民族,绩显华夏。第二,内容范围上将各种思想史书籍中普遍提法的“先秦时期”一分为二,划为“传说时期”和“夏商周时期”,使问题研究的思想更清晰,事件、人物的介绍更具体。同时,目前国内各类思想史研究者对本方向研究的终点大部分都在近代,即使说到现代也至多将时点定置在20世纪80年代,而本方向的研究以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为终点,将思想史研究的触角延伸到21世纪初期(至少为20世纪末期)。第三,研究体系上以时段(朝代)和管理思想的背景、轨迹、内容、特点为经纬,将整个研究体系划分为七个板块,自成体系。第四,分析层次上,一是在时间上尽量向两头延伸,代表人物以燧人、伏羲氏开头,以邓小平、陈云和当代领导人收尾;二是在空间上尽量多研究一些历史上的管理思想代表人物,其中不乏帝王、领袖、思想家和实业家等。

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已将中国管理思想史作为平台课,大一学生第一学期即开此课。同时,该梯队成员围绕课程建设进行了多项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学校成

教院工商管理本科学生开此课。今后，还将建议本校经济学院和高职院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也开设此课程。

本研究方向全面系统地从治世、经营、组织、驭人、教化和军争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三皇五帝、诸子百家、秦皇汉武直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华民族绵延 6000 年的重要人物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功绩，立意高远、角度全新。本研究方向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铸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原理》、总结和提炼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原则、定理、定律奠定基础；二是强化对学生的传统思想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总结中国的管理思想的宝贵民族遗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食粮。

本书的总体架构由王忠伟教授设计。《中国远古管理思想史》由费素斌主编；《中国上古管理思想史》由李奇志主编；《中国中古管理思想史》由赵亮主编；《中国近古管理思想史》由王书汉主编；《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由姜鹤主编；《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史》由朱晓林主编；《中国当代管理思想史》由贺伟主编。张德超和王艳芳老师参加了本书的资料汇集、附表整理、打印等工作。

由于史料收集和观点把握等原因，本丛书前四册首先出版，后三册待修改完善后陆续付梓。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0 年 3 月 20 日

于辽东千山之麓辽宁科技大学

序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承接阶段，管理思想没有跳出秦汉到隋唐时期的旧有框架和体系，只是对管理制度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和变革，乏见新意。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代表人物有宋太祖、赵普、范仲淹、王安石、叶适、耶律楚材、张居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熙、雍正、龚自珍等。

1.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1)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承接的现实背景。公元 960 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政变，建立了宋朝。宋朝又分北宋和南宋。与两宋基本同时期的还有辽、西夏和金等政权。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此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先后消灭了辽、西夏、金等，于公元 1271 年改国号为元，忽必烈为元世祖。公元 1279 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历经 276 年。公元 1644 年，清军入关，并迁都北京。宋元时期是由分裂而重新统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明朝和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的时期。

(2)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历史轨迹。从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轨迹看，宋元明清时期属于管理思想的承接时期，这当中又分为宋元与明至前清两个阶段。宋元明清，虽然社会仍在继续发展，但封建社会已从顶峰下滑，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王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主流是在承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其代表人物为范仲淹和王安石等。明至前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但封建生产关系仍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这一时期有贡献的管理思想，都是以揭露旧管理制度的腐朽或改革而表现出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明代后期的张居正；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前期两位杰出的皇帝康熙、雍正；清朝进步思想家龚自珍等。

(3) 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①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承接的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指从北宋开始到鸦片战争以前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鼎盛逐渐转入衰弱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管理思想没有新的发展，只是承接先秦时期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管理思想，或作些反思，或作些补充，都没有跳出原有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框架和体系，其内容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②宋元明清最突出的管理思想是对旧管理制度的调整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使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站出来，在不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旧管理制度作某些调整变革。例如，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革主张在当时都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今天看来，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2. 宋太祖加强皇权的思想。

(1) 削减地方长官的权力。州郡一级的地方长官不得兼任一个州郡以下的职务。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统统收归朝廷。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以便互相牵制。此外，又将全国分为十五路，每路设管理财政兼监察的“转运使”，管理司法的“提点刑狱”，管理军事的“安抚使”，管理救济及水利的“提举常平”，是为四司，统称“监司”。为了进一步消除地方官做大的可能性，宋王朝规定，路、州、县三级官员由中央官员兼任，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三年一替。

(2) 分割宰相的权力。宋太祖在宰相之下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并把晚唐五代临时设置的“枢密使”和“三司”作为常设官员，以前者分割宰相的军政大权，以后者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此二职与宰相的权力不相上下，更有意味的是，枢密使的设置可以直接牵制高级将领的权力。将军可以统领军队，但调遣权则在枢密使；而枢密使虽可发号施令，但却不能统领军队，这样可避免带兵者发动政变。

(3) 禁军不设最高统帅。宋太祖将禁军的两司（殿前司和侍卫步军司）改为三司（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又称三衙。三衙地位相等，鼎足而立，将领均用资历较浅而易于驾驭的人担任，且时常调动。禁军的调遣权同样归枢密使，其间关系同其他军队一样。而且，禁军的驻扎营地亦时常更动，而将领则不能随之迁移，从而使其不能同军队

常处。

(4) 推行并完善科举制度。宋太祖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序，扩大取士名额，使士大夫之优秀者都能为朝廷效力。宋太祖诏告全国：“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举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征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宋会要辑稿·选举》）。为杜绝座主与考生间结成密切的关系，杜绝“恩门”、“师门”的形成，宋王朝规定，举人经礼部的“省试”之后，必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使授官的举人是“天子门生”，而不是考官的门生。

3. 赵普的治国思想。

(1) 仁义开国与解除兵权。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位儒家谋臣，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虽读书不多，然经意于史事，有济世之才，作为北宋统治方略的核心决策者，他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任务，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结合点。据《北宋·赵普传》记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据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言及其仅读《论语》一书之事，赵普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分。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天下太平。”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最富含治国指导思想。

赵普以唐五代以来兵变的残酷现实说服宋太祖解除元老重臣的兵权，导演了“杯酒释兵权”之举。

(2) 偃革息武与通好契丹。北宋王朝稳定后，还面临着统一全国的任务。赵普一直坚持先南后北的方针。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北方有强大的契丹为太原北汉政权的后盾，既然后晋时契丹占领的燕云地区已经不可能收回，北方可能统一的范围也就是北汉盘踞的并州。契丹属边患，并州则是卧榻之侧。打下太原，又不与契丹交锋是统一战略的关键环节。赵普策略地收契丹定位为“戎狄”，是北宋的边患而非内部问题，应积极采取通好的政策，尽量避免战争。赵普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御戎策》和《谏太宗伐燕疏》中。

4. 范仲淹的管理思想。

(1) 行政管理思想。首先，整顿中书与枢密两院。范仲淹认为，这

两大政府机构大事不抓，办事不力，缺乏创造性。认为“两府间惟进拟差除，多循资级评论赏罚，各遵条例之外，上不专三公论道之职，下不专六卿佐王之业。”（《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奏乞两府兼判》）中央最高机构职责不明，于是，范仲淹向宋仁宗连上两个奏议，让宰相兼管，以减少职数，克服互相推诿，不干实事的现象。

其次，提高行政效率。针对原先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条贯太多，互不统一，甚至延误公务的弊端，范仲淹提出由中书、枢密院划一审核各机构的条文：“切见审官，三班院并铨曹，自祖宗以来条贯极多，乞选差臣僚，就审官，三班院并铨曹，取索前后条例，与主判官员同共看详，重行删定，画一闻奏，会中书枢密院，参酌进呈，别降勒命，各令编成例策施行。”（《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这样，就克服了公文来往递送，无人拍板的低效率状况。

（2）人才管理思想。范仲淹重视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提出了任用人才的标准。首先，求真务实，不作浮言，专于实事；其次，敢于直谏，革弊除害；最后，要用人专长，不求全责备。

范仲淹主张从改革科举考试入手来发现人才。自隋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各朝取士注重诗辞赋文，疏于关心国家时势的策论，不利于发现和选拔治国的人才。他建议在考试取士时“先策论以观其大要，以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存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这一主张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范仲淹创造了一个推介人才的制度——举主。举主推举的人才，“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当议旌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并与同罪。”（《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奏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这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创新。

（3）经济管理思想。首先，厚农桑。范仲淹认为厚农桑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它包括：开沟挖渠，修筑陂塘，救灾抗旱，鼓励稼穡等一整套农业管理措施。同时他还提出均民徭役，宽民赋敛的主张，保护农业的再生产条件。

其次，商业管理。范仲淹主张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并提高商税水平。他对正常的商业活动持支持态度，主张放手商人经营。

最后，荒政管理。对于荒政的管理，人们一般着眼于国家的救济措施和平时的粮食储备。范仲淹却从提倡富人高消费上想办法，通过向富人提

供服务,使饥民获得就业机会,度过荒年。范仲淹在实践中贯彻了《管子·侈靡》中富人消费的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机会的观点。有目的地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并大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理论,范仲淹的“荒政理论”说明他是这一理论的早期践行者。

5. 王安石的管理思想。

(1) 经济管理思想。第一,青苗法。颁行于公元1069年9月。从经济管理角度看,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由政府来举办借贷。但不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主要是用于限制和打击私人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起稳定粮价的作用,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二,募役法。颁行于公元1071年。此法旨在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其中规定官户、寺观等原不承担差役者交“助役钱”,体现了租税负担平均的平等原则。

第三,方田均税法。颁行于公元1072年8月。内容包括方田和均税两个部分。这是一个关于赋税改革的方案,反映的是王安石关于田赋管理的思想,归纳起来就是清丈土地,整顿田赋。其实施意义在于直接打击大地主的兼并努力,实现赋税均平,以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第四,农田水利法。颁行于公元1069年11月。其办法是:凡官民懂得农业和水利者,均可向各级政府陈述己见,一经采纳,即由官府组织实施,费用由受益农户摊付。其意义在于:上下结合,群策群力,体现了兴修水利的群众性;以民办为主,国家予以指导帮助;运用奖励手段调动广大官民的积极性;强调国家的统一规划和组织管理。

第五,均输法。颁于公元1069年7月。其办法是扩大发运司权限,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通盘筹划,灵活地征收,采买各种物品,即尽量在产区和附近的价贱地区征收或采购,以节省价款和运费。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

第六,市易法。颁行于公元1072年3月。其办法是:在京师及其他城市设立市易务,由国家拨款作为经营资本,进行平价收购商品的工作。市易务把收购来的货物赊给各行铺售卖,定期将货物偿还市易务,并按年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客商也可将卖不出去的商品折合成市易务的其他物品。这一方法借鉴了西汉桑弘羊的平准法,由国家掌控流通领域,操纵物

价，疏通渠道，以促进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2) 行政管理思想。第一，改革官僚制度。一方面，重用官位低浅，锐意创新的年轻人，不拘一格选人才；另一方面，对官吏队伍进行整顿，按政绩升迁官员，对办事效率低下的官员，坚撤不移。

第二，改革科举制度。废掉明经诸科的考试，只留进士科，考试也只考时事策，免去诗、赋、论。考进士科时，任选《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种，称为“大经”；兼治《论语》、《孟子》，叫做“兼经”。这一改革使得人才选拔更接近社会实际需要。

第三，改革行政建制。撤销一些州县，减少地方官吏，以节省国家开支和百姓负担。

第四，推行保甲法。即把农村人户 10 家编为一保，50 家为一大保。家有两个成丁以上的人户，选一人充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上阵。这样，既制约了百姓，也安定了社会，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3) 教育管理思想。首先，恢复各类学校。对中央最高学府太学的教育实行改革；其次，改革教学内容。变死记硬背为启迪学生思考，锻炼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后，增设新学科。设定武学、律学和医学，学业有成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予奖励。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置了“蕃学”。

6. 叶适的管理思想。

(1) 经济管理思想。首先，以功利主义为经济管理的原则。中国古代素有讳言财利的思想传统，叶适从经济管理的正确指导原则出发，主张把“义理”的“功利”统一起来考虑。他认为没有“功利”和“义理”对国家毫无用处，国家应对求利活动予以支持，不能束缚和抑制，“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叶适集·异法天下》）。

其次，以实行放任为经济管理的政策。自战国中后期以来，抑兼并已成为许多思想家的经济管理观点。叶适则独树一帜，明确提出了相反的见解。他既看到纵是天下之患，也看到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主张实行放任政策，同时又辅之以必要的国家干预。就经营形式而论，他主张以私人经营为主，以国家经营为辅。叶适反对王安石的市易、青苗等新法，认为它打击了商人，剥夺了商人、高利贷者的利益。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农工商谁也缺少不得，其间的分工和相互作用是社会兴盛繁荣的前提，不应分贵贱

轻重。这是对流行了千余年传统重本抑末观点的第一次公开否定。

最后，以保富养民为经济管理的目标。叶适认为，保富与养民是紧密相连的，解决了保富问题，养民问题也可得到基本解决。他认为，富人“供上”和“养民”的贡献。他明确反对采用“破富人以扶贫弱者”这样一类消极的养民办法，认为正确的养民办法应该是：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使贫者广开就业之门，速得生养之利。

(2) 行政管理思想。第一，叶适强调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他认为国君必须掌握“势”，必须把权威树立起来，这样才能按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

第二，叶适强调统治者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合作。他认为最大的忧患是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要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制度上的弊端。

第三，叶适提出改善地方政府管理的办法。他认为权力与责任结合是一条重要的管理原则，知县之所以难做，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力却要负全部的责任。他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国家去除烦琐的法令，繁重的徭役，繁杂的捐税，地方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要体恤百姓，忠厚待人，又不乏灵活变通妥协应付的才能。

第四，叶适针对兴办公共事业提出见解。他认为，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就可以命令，乃至强迫去做。要把将要兴办的公共事业的利弊分析给百姓听，也可以行使行政管理权命令百姓去做。

(3) 人才管理思想。首先，关于人才的重要性。叶适指出：“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渴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叶适集·上执政荐士书》）

其次，关于人才的选拔。他认为，光凭资格取人是选拔人才的大害，“计日月，累资考”的办法只能用于“衰时”，社会动乱时，只能以资格作为选拔的标准，但作为一项长久措施则有害匪浅。他认为，对于才能品德都好的人绝不可能因其资格不够便不加以选拔。

最后，关于人才的来源。叶适认为“夫士者，人才之本源，定国之命焉”。（《叶适集·科举》）他对于选拔人才的几种制度如荐举、科举等都给予相当的注意，并对此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7.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

(1) 以儒治国思想的提出。首先，“以儒治国”是蒙古入主中原的客

观需要。当时蒙古汗国的社会形态尚处于蒙昧状态，进入中原还不知道如何治理汉地，掠夺和屠杀现象时有发生，中原的历史倒退即将发生。于是，耶律楚材向元太宗建策：“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元太宗采纳建策，任用儒者，采行汉法，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其次，“以儒治国”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耶律楚材关于“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名言，出于刘邦对陆贾的对话。刘邦原来不尊重儒者，儒生陆贾向他宣传《诗》、《书》，他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无法回答，使他实现了从“得天下”到“治天下”的思想转变，并改变承袭秦制所推行的农战政策为“与民休息”政策。这样，才出现了后来的“文景之治”。

最后，“以儒治国”也是为了施展耶律楚材的个人抱负。以儒治国就是任人唯贤，耶氏精通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有“以仁义之道治四海”的抱负；他包容并蓄，注意吸收汉文化的精华；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是个通才或全能型人才。

(2) 以儒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采行汉法。所谓“汉法”，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汉族所实行的一系列封建制度。耶律楚材采行的汉法主要是：在经济方面采行赋税制度；在政治方面，立仪制，颁法令；在文化方面，实行科举制度。

其次，任用儒臣。蒙古是依靠强悍的，其他民族无法匹比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原先只懂得重武尚武，文治一片空白。耶律楚材是个儒者，深知治理天下必用文臣的道理。他仿效中原汉族地主政权那套尊礼、用礼、学经的儒家传统，力图兴起文治。他设置十路课税所时，课税使悉用儒士。后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于是文治兴起。

8. 张居正的治国理财思想。

(1) 行政管理思想。第一，省议论。张居正重“敦本务实”，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办事必须体现“省事尚实”的精神，“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所言者即求尽举行，其所行者即求有实效，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张太岳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第二，振纪纲。就是严法纪，张居正认为，法纪之废弛关键在于各级官府和权势之人。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官员的徇情枉法行为，做到“刑赏

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法所当加，虽贵道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张太岳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第三，重诏令。就是令行禁止，提高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办事能力。公元1573年6月，张居正奏请实行“考成法”。其做法是：中央指令既下，六部、都察院必须在数月之内作出处理，事理了然，明白易见的，有关衙门即应据理判断，不得推诿迁延；合行议勘向奏的，必须酌量事情缓急，道路远近，严立完成时限，设置文簿记录在案，至期完成注销。违限未销，停搁稽迟者，坐以违制之罪。

第四，核名实。就是要人当其用。张居正认为，“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为使中央能够“尊居九重，坐运四海”，公元1574年12月，他特意令人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均做成浮帖以便更换。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帝读书之处，朝夕省览。

（2）经济管理思想。第一，省征发，轻关市。张居正不赞成靠加重税赋以增加国库收入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主张通过减轻田赋来扶植农业，从而有利于商业，又通过减轻商税来扶持商业，从而有利于农业。

第二，节俭省用，与民休息。张居正在当政期间，大力删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不必要开支，同时力谏神宗节省官室费用。为此，国家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第三，治理黄河，排除河患。张居正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训督修黄河，在黄河、淮河之间筑起延袤800里的两道大堤，堵塞决口130多处，使河道畅通无阻，从此徐淮之间河患平息数十年。

第四，整顿改革赋税制度。张居正为了抑豪强而均赋税，于公元1577年11月在全国进行土地清查，并针对赋役制度的弊端，推行了“一条鞭法”。这一方法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制，是中国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简化了赋役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营私舞弊的可能。

9. 明清之交三大思想家的管理思想。

（1）黄宗羲的管理思想。第一，继承儒家民本思想，反对封建民主专制。他认为，历来的君主都是“天下之大害”，为了一己私利，“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他认为，做臣子的对皇帝不应盲从，做官的则应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

原臣》)

第二,主张复井田,反对限田和均田。他提出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主张复井田。其方案虽行不通,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主张减税和田赋征实。他认为,当时赋税过重,主张减赋,同时,土地肥瘠不同,交纳的田赋也有差别。他主张废止田赋征银,改征实物。

第四,主张工商皆本。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各省,开始形成一个市民阶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为使工商业发展,他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繁荣经济。

(2) 顾炎武的管理思想。首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他提出一个“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改革举措。即将知县“封建”化,提高品级,位可世袭。

其次,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他主张由帝王审择的上层官员各自举荐可靠人物由吏部加以详细考察,再委以中下层官职。“取士之制”,则由乡里举选,每县隔年选一人,经吏部考试择用。他批评明末官制叠床架屋,行政机构头重脚轻,他列举历史典章,认为官职设置应该有比例,有次序,大官少,小官多。

最后,改革田赋管理制度。一是改革苏州等地的田赋。顾炎武主张重新清丈土地,分三等定赋。二是不通商的州县田赋“征本色”。这是因为偏僻地区银子难得,田赋征银造成很大危害。

(3) 王夫之的管理思想。首先,赋税管理方面。王夫之认为:“钱谷者,国计之本也;赋役者,生民之命也。”(《读通鉴论·炆帝》)他主张“役与赋必判然分而为二”。(《思问录外编·思问录》)他又反对两税法 and “一条鞭”法按资产征税,主张以夫定赋。关于赋税征折色,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较黄宗羲、顾炎武大有进步。

其次,田制管理方面。王夫之对井田制持怀疑态度,否定那种授田还田的井田制的存在,也不同意限田、均田等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管理办法,认为土地兼并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责任不全归咎于豪强。他主张通过租税制度的改革来影响土地兼并。

最后,商业管理方面。王夫之认为:“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徇民利,而民亦待命焉。”(《宋论》卷二)他